

1 “王成”确实还活着

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——王成，他的原型之一还活着。

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说：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。”但是，在那场艰苦的战争中，只有一名战士，他的事迹直接激发人们创作了“向我开炮”的经典情节。

1953年4月，陆军23军67师201团步兵机员蒋庆泉及战友，在朝鲜石岘洞北山遭到强敌围攻。绝境中，他向步话机高喊：“向我的碉堡顶开炮！”

蒋庆泉的故事被23军《战地报》记者洪炉了解后，写成了通讯《顽强的声音》。同年7月，23军73师217团的步兵机员于树昌也在战斗中呼唤炮火，与敌同归于尽。

洪炉根据未能发表的《顽强的声音》，以于树昌为主角另写了一篇《向我开炮》。

与洪炉相熟的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，在创作电影《英雄儿女》时用“向我开炮”的情节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，并根据另一位烈士杨根思的事迹，设计了王成手持爆破筒扑向敌人的壮烈结局。

于树昌与杨根思确已牺牲。但是蒋庆泉，这个最初促使洪炉写下“向我开炮”的人，半个多世纪来一直默默生活在辽西平原的乡村里。

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夏日傍晚，蒋庆泉和老伴去公社看电影《英雄儿女》。回来的路上，蒋庆泉哭了。他想起那个亮如白昼的夜晚，想起那部被打坏的步话机，想起那个喷洒鲜血的阵地。回到家，他在被窝里又哭了。

2004年前后，崔永元的《电影传奇》请了洪炉等老同志讲述《英雄儿女》的幕后故事。洪炉谈到了这位他从未谋面、已下落不明的英雄。看过电视，蒋庆泉的妻兄和同村一个农民找到他，问他是否就是这个蒋庆泉。蒋庆泉说，没这事。

2 “向我的碉堡顶开炮！”

1928年，蒋庆泉出生在辽宁锦州松山新区大岭村。小时候，他给地主打小工，在店铺当学徒，还去黑龙江放羊。1948年春节刚过，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表兄蒋庆云找到了他，拉他加入国民党军队。

辽沈战役之前，蒋庆泉知道长江守不住了，如果再撤离，就会离家越来越远。他脱离了国民党队伍，加入了解放军。他说：“那时候也不换衣服，我自己还带了一支枪。摘了帽徽，我就跟着解放军追击国民党队伍。我参加的部队是第三野战军23军67师199团1营3连。”领导看他记性好，脑子转得快，就让他当步兵机员（即步话机员）。1949年4月，蒋庆泉才加入解放军，1950年10月，他就随浙江新昌入党，并立了两次三等功。

1952年，蒋庆泉和战友们到了朝鲜，当年12月底到“三八”线接替38军防务。他们在石岘洞北山，对面是美军7师，一个王牌部队。

“1953年4月16日晚，我们三打石岘洞北山。我所在的5连打头阵，一百五六十人冲上去，最后就剩了十几个人，连长、排长都牺牲了。我本来是要跟营长下去的，但后来上来的4连步兵机员也牺牲了，我就留了下来。打到第二天天黑时，又只剩十几个人。”蒋庆泉回忆，“我们晚上先打退了两次进攻。敌人的炮打得像下雨，后来我们的枪都不能用了。为什么？地上的土被炸起来，‘呛’的，用布包着枪都不行。后来就扔手榴弹，最后退到碉堡里。敌人就在我们碉堡外10米远的地方，围着我们打，用机枪封锁我们的射击口。”

就在这种时刻，蒋庆泉向步话机喊：“向我的碉堡顶开炮！我们不撤了，也撤不下去了，就战死在这里吧！”他说，那时候没想别的，就是想让炮弹向他们开炮，把敌人也炸死。

但是，他还是没有看到炮弹：“敌人第四次进攻时，堵着碉堡口拿火箭筒打，我的耳朵都被震聋了，只见火箭弹打进来一闪光，我就被打晕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醒了过来，发现血从头顶流下来，把眼皮都粘住了，腿和后背都受了伤。那个拦着不让我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，胸口也在喷血。我使劲爬起来，敌人又扔了一个毒气弹，好像是蓝光、灰烟。我们被呛得不行了，在碉堡里又呆了20多分钟，就想往外冲，刚出来就什么都知道了。”

《英雄儿女》“王成”原型还活着



蒋庆泉老人

“为了胜利，向我开炮”这句经典台词在人们心中萦绕了40多年，亿万国人因此记住了王成。这部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《英雄儿女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。

抗美援朝战争中最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，他的原型之一——陆军23军67师201团步兵机员蒋庆泉还活着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他一直默默地生活在辽西平原的乡村里。



王成手握爆破筒，高呼“向我开炮”的情景，震撼了无数国人的心。

3 英雄的名字出现在战俘名单上

在志愿军主阵地和部队出发阵地之间有上千米空地。战斗开始后，敌人的炮火就彻底覆盖了这条必经之路，支援部队伤亡惨重。

当时团部与蒋庆泉直接联系的是步行机员陆洪坤。据他回忆，当时67师不仅使用了自己的全部炮火，还借用了其他部队的火炮和炮弹，“后来军首长让把‘喀秋莎’也开上去了”。

陆洪坤在步话机中听见蒋庆泉不断报告敌人的位置：200米、100米、50米、20米……“他说：直接向我的碉堡顶开炮！我问他：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？他说：别管了，快开炮吧！”陆洪坤回忆说。

但这时，志愿军方面已经没有炮弹了。

后来的两个多小时里，炮兵断断续续向北山阵地支援。陆洪坤听见蒋庆泉说敌人把炸药吊到了碉堡门口，“炸我了！炸到我了！”还听见他高喊：“共产党万岁！”一直到步话机中完全沉寂下来。

惨烈的第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一直持续到4月18日晚，小小的北山饱浸鲜血。前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中，几经补充的201团5连前后有200多人阵亡，包括3名连长、1名政委、12名正、副排长。

7月，67师以14个步兵连、30个炮兵连、16辆坦克再次进攻石岘洞北山。经过一周时间的反复争夺，志愿军终于彻底控制了石岘洞北山，使其在停战协议签订时划归中朝一方。

洪炉就是在第四次进攻时登上石岘洞北山的。他回忆说，战士们在挖工事时根本没放下铁锹，因为沙土下就是敌我两军阵亡者的尸体，层层叠叠。

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发现蒋庆泉的遗体，但他的事迹在步行机员中广为传播。洪炉写出了《顽强的声音——记步行机员蒋庆泉》，政工机关也准备为他报功，并向军内外宣传他的英雄壮举。

然而，随后政治部传来消息：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，有蒋庆泉的名字。

4 被俘的阴影笼罩一生

蒋庆泉说，他醒过来后，发现自己和碉堡里一起战斗的人都被俘了。“敌人用卡车把我拉走。我躺在车厢里，上边架的就是美国人的尸体，血滴在我下巴上、脖子上，都凝成血块了，我也没劲儿抹一下”。

那天晚上，敌人第一次审问他，问他去哪儿，他说要回家！

“我被先拉到医院，随后转到釜山战俘营，后来又转移到济州第八战俘营。我所属的那个队，大家都是要回大陆的，曾在战俘营里升五星红旗。为了升旗，牺牲了很多同志。这都是我去了以后才知道的。送我们回来那天，板门店搭了一个很大的门。我把战俘上衣脱了，使劲扔在地上。裤子没敢脱，因为敌人不给发内衣。我就这样光着膀子走过去了。”蒋庆泉说，“走过去，大家就抱着哭。180师那个团参谋长是先回来的，他给我们讲话，说祖国欢迎你们回来！我记得特别清楚，他给我们发慰问品，里面有一盒‘大中华’，抽到这个烟，我们就是回家了。”

按照当时的规定，对被俘人员不得进行宣传。洪炉写好的通讯也没能发表。后来担任23军军长的黄浩在回忆石岘洞北山战斗时特别提到，“于树昌与蒋庆泉事迹相同，被宣传出去了，而最早被发现的英雄蒋庆泉，却被埋没了，连他的名字都被忘了！我为此深感遗憾。当年的战斗中，有多少这样的无名英雄”。

当年，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回到国内后，就被送到了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。

在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，记者查到了保存完好的蒋庆泉的档案。厚厚的被俘登记材料占据了蒋庆泉档案的主体，而那段被俘经历的阴影笼罩了他的一生。

电影《英雄儿女》放映后，儿子蒋立问他抗美援朝的经历，蒋庆泉沉默许久，说：“没有开炮那不是我的原因。”

2009年，他让儿子带自己去了一趟丹东。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岘洞北山战斗展台，蒋庆泉看到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，这个沉默的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气，一定要把照片撕下来。蒋立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架出去。

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50多年了，可蒋庆泉内心的那场战争似乎从未停止。

“刚开始都说我死了，还给家里发补助，后来补助停了。‘运动’的时候要斗争我，说我是叛徒。最后，上面有人下来，在大队部公开宣布，取消对我的党内处分，我哭了，我委屈啊！”

蒋庆泉说：“我为啥要撕纪念馆里那个炮兵阵地的照片？因为我后来看不见他们打炮了呀——他们打炮我就死了，就不会被俘了。”（据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）